

研究論文

考古人類學刊・第 93 期・頁 133-168・2020

DOI: 10.6152/jaa.202012_(93).0004

鳳山縣舊城南門段城牆考古地層的廢棄形成過程

鍾國風*

摘要

史坦 (J. Stein) 倡議文化地層單位，並呼籲考古學家將人為作用於地表所形成的考古地層從地質學沉積地層中解放出來，同時關注文化轉型與自然轉型並進的遺址形成過程。此一深具人為文化意義的考古地層，不同於自然地層純物理性的沉積原則，更反映著人們佔居地表的複雜作用能力。而哈里斯矩陣 (Harris Matrix) 層位分析系統，尤適用於複雜考古地層的紀錄方式。

本研究採開放區域發掘策略與自然層位發掘方法，且應用哈里斯矩陣於發掘鳳山縣舊城歷史遺址的考古地層堆積分析，嘗試探究圍繞在清代城牆的建造、使用、廢棄、拆毀等過程，呈現地層堆積、疊壓、打破、填埋等一系列形成過程背後的堆積事件與行為意義，建構舊城南門段城牆的地層堆積與疊壓時間序列。同時，本研究方法能有效提升考古發掘田野上思考層位判斷與紀錄的系統性關聯，豐富考古地層形成過程的意義與脈絡性解釋。

關鍵詞：考古地層，哈里斯矩陣，鳳山縣舊城，形成過程

* 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feng@ncku.edu.tw。本文得以付梓，感謝匿名審查人、責任編輯、編輯委員會等細心的審閱與寶貴的意見，使得本文討論議題更聚焦與文章結構更完整。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during the Abandonment of the South Gate Wall of Old Fongshan County

Kuo-feng Chung*

ABSTRACT

With the idea of ethnostratigraphic unit, Stein (J. Stein) urged archaeologists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concept of geological sedimentary strata when looking at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created by human action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transformations during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Rich in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is not always directly subject to the laws of natural deposition. Instead, it more strongly reflects the diverse forces and impact on the ground of human occupations. To document the complex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the Harris Matrix system is considered particularly desirable and applicable.

The excavation of Old Fongshan County Historical Site applied open area excavation strategy, natural layer excavation methods, and the Harris Matrix.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unravel a series of depositional events of strata accumulation, superposition, removal of deposits, and land filling that result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use, abandonment and destruction of the Ching Dynastic city walls. In doing so, we reconstruct the stratigraphic sequence of the south gate wall of Old Fongshan Coun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arris Matrix can serve as an extremely useful aid in recognizing distinct deposit units on site and in making systematic correlations of the recording of these units, thereby enriching the meanings and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ocesses by which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is formed.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Harris Matrix, Old Fongshan County, formation process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feng@ncku.edu.tw. This article has been published, thanks to the meticulous review and invaluable comments of anonymous reviewers, editors in charge, and editorial board, which made this article more focused and more complete.

一、考古地層的形成與紀錄

行為考古學家 Schiffer 針對遺址形成過程提出一個關鍵性問題「文化系統中的行為如何形成考古紀錄呢？」(Schiffer 1972: 156)，Schiffer 反對當時的過程主義將考古遺留空間分布模式視為直接反映人類過去行為空間模式的重要基本假設，強調考古學家必須意識到人工製品從文化系統脈絡進入考古脈絡所受到的文化轉型與自然轉型的形成過程。人們作用於地表與遺留的各種人工製品，進入考古脈絡堆積成「考古地層」(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無疑是異於自然的一種新型態地層的表現形式。自然傾向的地質地層與文化傾向的考古地層，儼然於看似漫長的晚近人類活動作用於地表堆積形成過程中劇烈地交互影響。其中，人為考古地層的形成脈絡深受考古學家關注，且為考古學研究的主體之一，尤其表現在田野考古的發掘與紀錄方法。

近年來臺灣考古學界對於考古層位的發掘與紀錄方法，常囿於抽樣與全面發掘、人工水平層位與自然層位發掘方法的二元對峙狀態，反而疏忽考古地層受文化與自然轉型形成脈絡上的探究。2008-2012 年因應花岡山遺址的沙丘堆積型態，考古發掘方法採平翻式自然層位法 (natural layer excavation)，分層的標準包括土質、土色和遺物密度的差異，相當於 Stein (1987) 所稱「文化地層單位」(ethnostratigraphic unit) 的概念 (趙金勇等 2013)，主張平翻式自然層位發掘法較能呈現遺物遺跡在平面上的關聯性，以及古人活動的空間脈絡如聚落格局、墓葬模式等，但難處在於掌握土質、土色與古地形的變化 (劉益昌等 2015)。考古發掘策略採開放區域發掘法的設計，發掘方法採自然層位法，尤其適用於多文化層與斜坡堆積的考古遺址或是長期佔居具繁複疊壓打破堆積地層與遺跡的城市遺址，關鍵在於發掘者面對複雜的文化地層時所秉持的地層堆積原理的認知，地層構成內涵與堆積模式的觀察、描述與理解，以及地層界面分層標準的辨識與判斷的敏感性慣習。

考古學家如何從地質地層中將人為作用於地表所形成的考古地層解放出來，強調人為文化形成的「文化地層單位」概念呢？回歸文化地層所採借的地層學地質層位屬性的討論，Salvador (1994) 主張地質層位乃研究所有形成地殼的岩體 (包括沉積岩、火成岩與變質岩) 及其組織的科學—進行岩石的描述、分類、命名，強調其不同空間地域與年代序列上的關聯性。然而，此地質層位的屬性與尺度，難以窺探帶有人為活動文化屬性的文化地層單位。Stein (1987, 1990, 2001) 基於土壤沉積學原理，視考古遺物如同生物地層單位 (biostratigraphic unit) 中的標準化石，那麼人為活動遺留所形成的地層則可視為有別於純自然沉積的文化地層單位。Stein (2005) 主張地層學中來自地質學

的自然地層與考古學的考古地層，有著不同的視角與定義。強調考古地層學是對分層堆積的研究與解釋，關注地層疊壓打破關係，從而達到斷代的目的，建立年代時序關係。Stein and Holliday (2016) 認為一個遺址可能包含數百個疊壓的沉積層位，諸如廣場、牆基、街道等建築結構，但在每種情況下都需要通過地層來解釋人工製品和建築的年代關係。地層在重建人們所佔居的地景、過去環境與瞭解遺址形成過程甚為關鍵。Harris (1977, 1979, 1989; Harris et al. eds. 1993) 提出「哈里斯矩陣」(Harris Matrix)，為著名和應用最廣泛的考古地層分析系統，適用於具有大量遺跡和文化遺物的複雜佔居歷史的遺址。關於此「文化地層單位」即為考古學家長期發掘的各種文化遺留或歷史結構遺跡的考古地層，此人為支配與作用形成的地層於近年因地球環境劇烈變遷而受到各學科的持續關注。

近年來學界持續熱議「人類世」(Anthropocene) 的概念、年代與內涵，刻劃了人類行為如何地作用與改變自然地表，因而形成考古地層紀錄。Crutzen 和 Stoermer (2000) 認為現代技術引發地球系統行為的轉變並改變環境，指涉人類世為人類活動支配的階段，且隨著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人類改變地球環境與地貌的能力顯著增加。Wilkinson (2005) 主張人類在各種建築和農業的活動過程，移動與運輸大量的岩石與沉積物，快速的侵蝕和沉積產生地層紀錄，人類成為侵蝕的主要推動者。Hooke (2000) 強調隨著掘棒和鹿角器等器具逐漸被鐵鍬和當代大型挖掘機所取代，人們通過在建築和採礦活動中移動土壤與改變地景的能力和動力遽增，成為刻劃地形地貌的主要代理人。Ruddiman (2005) 推斷全新世尺度 (Holocene-scale) 人為溫室效應，始於人類為了生存定居、動物馴化和農業耕種，放棄狩獵－採集者的生活方式。Harris (2014) 主張 1970 年代對於獨特「考古地層」辨識，無疑促使考古學家更加關注於人類文化性創造出的地層型態，並提供一種方法來研究「人類世時代」(Anthropocene era) 的人類活動地層。Harris 認為考古地層始於人類進入地質領域，並且為往昔僅由自然所進行的「地球建設」過程中帶來一場革命，主張人類世始於人類的第一次挖掘與作用於地表之初，表現在考古地層紀錄中的遺存，而考古地層學原理勾勒出一個新時代，並定義地層研究和紀錄的方法。Harris 進一步解釋考古地層內涵與地質地層之間的差異：其一，人們開始製造與自然演化不相符的人造物。其次，通過修建活動，人類界定優先使用區域，因此誕生新型態的地層類型，它不是自然力量所造成，而是具有文化傾向。其三，修建活動指涉的不是通過自然侵蝕過程，而是通過文化偏好進行挖掘所創造新的地層形式，進而改變自然地質的沉積和地表。此一變革，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進而將地質地層和考古地層分開，以及自然與文化分開。

考古學家從地質地層中將人為作用於地表所形成的考古地層解放出來，視人為遺留堆積構成文化地層單位，同時關注文化轉型與自然轉型的沉積形成過程。此深具人為文化意義的堆積單位，有別於自然沉積的純粹物理原則，相反地擁有人們佔居與作用於地表的複雜能動性。而考古學家如何基於考古地層學原理，透過發掘策略與發掘紀錄方法，進而解構與建構考古地層，實有著長時期的發展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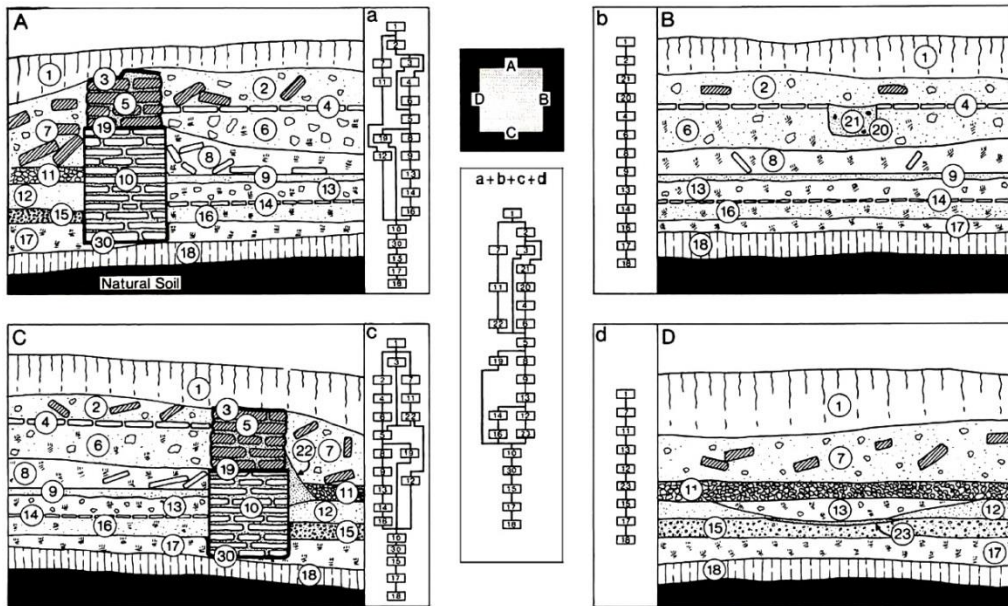
回顧考古學家對於考古地層的發掘策略與紀錄方法，儼然有著不同的時空背景。進入 20 世紀的現代科學，考古田野工作逐漸擺脫或不滿足於往昔僅僅追逐珍稀古物的目標，或僅視地層中的人工製品如同「化石」般所建構的時間序列。Carver (2005) 從文化歷史學派、過程考古學派、後過程考古學派等現代考古學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概述考古田野發掘與紀錄方法的變革。首先，文化歷史學派時期，考古學者開始關注地層學原理與分層。Wheeler (1943) 發掘英國多塞特郡鐵器時代 Maiden Castle 山丘壘堡，發掘方法採探溝橫截土牆方式，目的為研究探溝垂直剖面上的層位序列，進而解釋城牆如何修築與擴建過程。Wheeler (1954) 強調由橫樑隔開的探坑網格系統「Wheeler box-grid method」，按照地層早晚關係發掘，探坑四面「垂直」的地層剖面，得以紀錄遺物與層位的關係與時間序列。Wheeler 學生 Kenyon (1952) 延續此發掘方法應用於約旦河谷 Jericho 遺址，此發掘紀錄方法與概念成為「Wheeler-Kenyon system」，豐富考古地層學理論，涉及地層界面的價值和層位編號，並賦予人工製品系統性來源 (Harris 1989)。然此階段的考古發掘與紀錄，仍著重在垂直性 (verticality) 剖面的遺物與層位的時間序列，且網格狀的隔樑土牆，阻礙發掘過程對於文化層位所反映的聚落地景空間脈絡的整體性理解。

1960 年代過程學派時期，如北美新考古學家 Binford (1964)，視遺址為埋藏的文化系統的組成，如同社會科學家，透過「抽樣」可以考察過去的社會行為以瞭解已消逝的古代社會。抽樣的假設依據為調查越隨機，答案就越少偏見。田野發掘方法上，多採小型探坑和長方形探溝，以固定間隔、隨機布置探坑與探溝的方式抽取研究調查與發掘所需樣本。發掘方式採挖掘到底，按照「主觀分層」(水平分層) 或自然地層 (Carver 2005)。此外，在抽樣的策略基礎下，Redman (1987) 發掘廢棄的 Qsar es-Seghir 穆斯林城鎮，採階序系統性均勻布置探坑，發掘過程如遇生活面的街道與建築遺跡，則進階採拓坑揭露完整結構或建築的發掘方式，以更全面性地瞭解遺址的整體空間型態與活動遺留。

同時期的英國，Biddle 於 1962-1971 年間在溫徹斯特 (Winchester)、Barker

(1975) 在羅克斯特 (Wroxeter)，均運用「開放區域發掘法」(open area excavation)，採大面積逐層方式發掘，同時分開紀錄每層遺跡的形狀與位置，此時期開放區域發掘法已開始在歐洲考古田野中實踐。與此同時，Foster 和 Heighway 於 1972 年間主持約克 (York) 考古發掘工作 (Richards et al. 1989)，應用脈絡關係單位 (context)，context 是地層單位，如一個地層、一個界面，或是居住面、灰坑邊緣、建築基石、探溝邊緣 (Carver 2005)。Harris 於 1973 年發明哈里斯矩陣，作為遺址地層紀錄方法，且於英國溫徹斯特 Lower Brook Street 遺址發掘使用。Hobley 於 1974 年倫敦博物館大型挖掘中，使用「單一脈絡平面圖 (single-context planning) 與「哈里斯矩陣系統」(Harris Matrix system) 新發掘紀錄方法並取得巨大效度 (Harris 1989)。1975 年，Ottaway 在英國溫徹斯特的史前渠道探測研究，紀錄下遺址每個被發掘的層位 (Harris and Ottaway 1976)，哈里斯矩陣被證明為一種有效的發掘紀錄方法，並為考古學創造出一種新型態的考古地層紀錄與整合系統。

1979 年 Harris 結合地層學原理與田野發掘紀錄方法的矩陣圖表—即紀錄成層單位 (unit of stratification) 的哈里斯矩陣，出版 *Principle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基於地層學原理中的地層疊壓律 (Law of Superposition)、原始水平律 (Law of Original Horizontality)、原始連續律 (Law of Original Continuity)，且增添新的地層接續律 (Law of Stratigraphical Succession) (Harris 1979, 1989)，哈里斯矩陣的實踐，表明地層學第一次真正地獨立於剖面，在英國田野考古學史上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 (Harris 2017; Lucas 2001)，透過哈里斯矩陣得以整合複雜多樣的堆積單位之間的同時性與貫時性的脈絡關係，提升考古紀錄系統的綜觀性與系統性分析，跳脫往昔僅強調地層剖面的單一垂直時間序列 (圖一)。Harris 採開放區域發掘策略，強調地層堆積單位的不同形式，重視層位橫向空間與平面圖繪製，哈里斯矩陣圖的考古地層配置呈現三維時空概念展現地層疊壓脈絡，視分界面 (interface) 為地層序列重要的分析單位，指涉地層之間關聯性，界定出過去人類行為 (D'Amore 2014)。



圖一 Harris (1989) 根據地層接續律合併四個地層剖面形成單一的 Harris Matrix 地層序列圖 (引自 Harris 1989: 圖 21)

近期的後過程主義時期，發掘與紀錄方法多延續開放區域發掘法與自然層位發掘法，然於田野發掘實踐上朝向更多元與開放態度，如 Hodder 強調對遺址進行反覆性解釋，發掘過程可視為闡釋遺址文本的過程。Hodder 於 1993-2017 年間在 Çatalhöyük 遺址的考古實踐，強調反身方法 (reflexive methodology)，對發掘的反思性可以通過發掘、紀錄、分析三者同時進行，且鼓勵發掘過程中調整發掘方法與對各種遺跡進行多方詮釋。反身方法強調「反身性」(reflexivity)、「關聯性」(relationality) 或「情境性」(contextuality)、「互動性」(interactivity)、「多元話語性」(multivocality) (Hodder 1997, 2000)。¹

因應哈里斯矩陣方法於考古田野發掘與紀錄上的適用，2009 年中國國家文物局頒布《田野考古工作規程》，推展考古發掘需建立堆積 / 遺跡單位關係「系絡圖」，用圖形形式表達堆積單位之間、堆積單位與遺跡單位之間以及遺跡單位之間的層位關係，以提升考古紀錄系統的全面性、系統性和規範性 (湯惠生 2013; 趙輝等 2014)。系絡圖繪製包括單個 (組) 遺跡系絡圖、探方系絡圖和發掘區系絡圖。系絡圖最特別的是保留與沿用中國考古以往田野發掘對於遺跡現象的分類與命名，如灰坑為 H、房屋為 F、墓葬為 M 等，其好處是在圖表上明確紀錄地層單位的屬性，保留發掘現場分析判斷的研

究過程（趙輝等 2014）。

近年臺灣因應歷史考古學的發展，分別由代表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現改制為科技部）的臺灣大學 Jose Borao Mateo（鮑曉鷗）與西班牙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委員會（CSIC）的 Juan Vicent García 和 María Cruz Berrocal，從 2011 年開啟為期三年的「福爾摩沙 2010 計畫」（Formosa Program 2010），進行和平島西班牙殖民時期的考古研究，且延續促成 2013-2016 年由臧振華與 María Cruz Berrocal 主持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和平島考古研究贊助項目（Cruz Berrocal et al. 2018）。和平島考古發掘顯示人們長期連續性佔居與殖民的複雜考古地層，同時凸顯臺灣考古田野首次適用歐洲哈里斯矩陣方法建構發掘區域的層位堆積序列（Borao Mateo 2015; Cruz Berrocal et al. 2015）。

回顧考古地層的建構過程，因應文化轉型形成的考古地層的空間維度與堆積序列的複雜性，考古發掘策略多朝向「開放區域發掘法」，發掘區域不再保留網格隔樑以避免其阻斷聚落地景的空間訊息；發掘方法傾向「自然層位發掘法」，強調地層堆積原理與時空脈絡；層位紀錄與分析方法則採用「哈里斯矩陣」，關注層位脈絡關聯性與考古紀錄的系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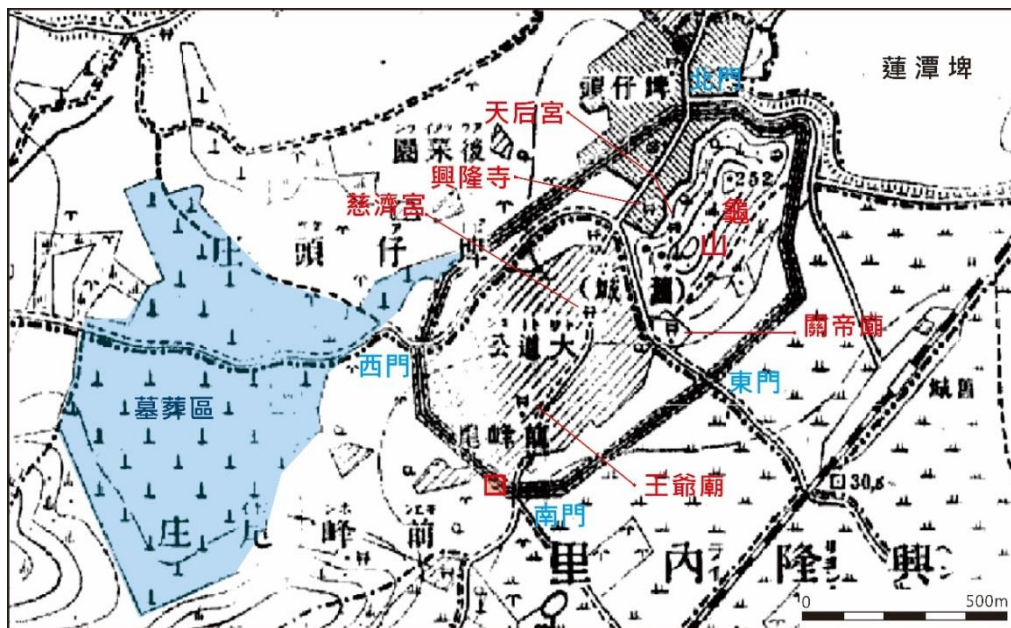
本研究以近年「鳳山縣舊城考古計畫」² 中舊城南門段城牆的考古層位資料，提出考古地層文化轉型形成脈絡於哈里斯矩陣層位建構的應用。「鳳山縣舊城考古計畫」首先進行舊城考古研究的整體規劃設計與評估；其二，鳳山縣舊城擁有複雜的聚落發展以及城垣建造與廢棄的更迭歷史，適合進行哈里斯矩陣系統性的層位紀錄方式，發掘策略與方法上採取開放區域發掘法與自然層位的單一地層脈絡單位的發掘方法，發掘流程乃依據地層構成（土色、土質、遺物、堆積模式等）做為劃分不同堆積單位（如活動堆積地層、城牆、建築基礎、墓葬、灰坑、柱洞等）之依據，發掘過程需隨時觀察不同堆積單位之間的界面，判斷層位之間的疊壓、打破關係，按照地層或遺跡之間的堆積序列依序發掘，如此得以系統性地解構複雜的歷史層位與相關行為事件的形成脈絡，進而探究鳳山縣舊城的文化轉型形成過程。

二、鳳山縣舊城考古

鳳山縣舊城為全臺迄今仍保有相對完整城牆結構的歷史時期考古遺址，複合疊壓臺灣新石器時期的考古地層，二者分布與重疊範圍約介於龜、蛇二山之間。

從 1904 年臺灣堡圖（圖二）觀察，日治初期鳳山縣舊城的城牆與城內空間佈局仍相當地完整，南北大街與東西大街交錯的位置，位於城內中間偏北側，以幾乎近九十度的方式交錯，顯示此十字形大街交叉口的西南側與大道公街之間，疑為昔日官署所在行政區域。而城內西側穿越西城門出城的區域，無疑是生死別離的城外墓葬區。從南門入城沿著官署南側前峰尾的大道公街（縣前街），昔為清康熙年間的興隆庄街區，途經慈濟宮後一路往東北，沿著北門內街穿過北城門外埤仔頭構成繁華的商業街區（圖版一 a），往北一路前往臺南府城。從北門內街沿著龜山腳南下前往東門的街道路途，可見龜山北側坡階上天后宮及山腳下興隆寺，龜山西南山腳下東門內街的街道兩側則為慈濟宮與關帝廟等重要漢庄信仰廟宇。

20 世紀初期的鳳山縣舊城，城池規模與布局仍舊完整，然城垣已不具政治與防禦功能，聚落內常民市街活動也已持續地往北門外移動，城內儼然呈現廢棄中狀態。



圖二 1904 年臺灣堡圖所示鳳山縣舊城的城牆、街市、廟宇、墓葬區等空間分布
（紅色方框為本文舊城南門段城牆發掘區位）

鳳山縣舊城考古學研究主要歷經三個階段，1990 年代臺灣歷史考古學開端，³ 此階段正值臺灣解嚴後與臺灣本土歷史研究方興未艾之際。當年考古試掘目的為評估舊城歷

史考古學研究可行性，利用地層出土漢人文化遺存建立一個漢人陶瓷器年代學。方法上針對鄭成功所設軍屯的早期漢人聚落前鋒尾所在區域，進行目的性抽樣試掘，首要目標為嘗試建立陶瓷年代學（臧振華等 1993）。

2000-2015 年期間為文化資產價值評估階段，何傳坤等（2001）因應高雄市養工處計畫於鳳山縣舊城範圍規劃左營二號公園，於左營舊城東門西北側發掘抽樣探坑，確認左營舊城遺址具有史前新石器時代中期牛欄子文化與清代漢人兩個文化層。劉益昌等（劉益昌、李德河 2004；劉益昌等 2009）因應國防部軍眷服務處規劃於「外興隆營區」興建公寓，進行開發基地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方法上以系統探坑規劃發掘四個塊狀區，採自然層位和人工分層發掘方式，火塘、灰坑、堆石結構、磚塊堆疊結構、土石牆結構等遺跡，均以現象（feature）方式紀錄。此外，透過考古層位學、建築遺構（磚石材料、施工技法或砌法、黏結材料）、文化遺物（陶瓷器、錢幣等）建立歷史時期年代序列。顏廷仔（2014）針對西自助新村遭受拆除，大規模地翻攪地層，導致鳳山縣舊城西城門及城牆殘蹟裸露，進行考古清理、紀錄與整理工作。顏廷仔（2015）針對鳳山舊城西門段原西自助新村區域，進行考古抽樣試掘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釐清「左營舊城遺址」新石器時期大坵坑文化、繩紋紅陶文化、鳳鼻頭文化等時期文化內涵與分布範圍。

鳳山縣舊城考古發掘，早年採抽樣方式進行，從純學術研究取向到文化資產被動式的考古試掘評估，一方面對於歷史時期發掘層位描述，著重在垂直界牆剖面地層的應用，結合遺跡結構與出土陶瓷遺物的年代分析，建立歷史陶瓷年代學；二方面著重在史前「左營舊城」遺址範圍與文化內涵的理解。

2016-2020 年起為「鳳山縣舊城考古計畫」研究階段，鍾國風等（2018）針對鳳山縣舊城考古進行整體性的研究規劃與設計，參考 1903 年日治時期測量地籍圖資所反映的舊城社會地景，做為舊城歷史考古系統性空間規劃的基礎。其二，採自然層位發掘方法，運用哈里斯矩陣紀錄考古地層脈絡關聯性與地層堆積時間序列；其三，強調社區參與，建置在地考古社群，開放多元話語，對於舊城生活、廟宇、空間、二戰史蹟等進行對話，有助於發掘過程對於歷史遺跡的解釋。鍾國風、劉益昌（2019）於鳳山縣舊城整體考古研究規劃設計的基礎下，針對鳳山縣舊城南門段城牆殘蹟分布敏感區進行考古發掘評估工作。此階段的田野發掘紀錄方法，其一，延續自然層位發掘方法，以及哈里斯矩陣紀錄考古地層序列與脈絡關係；其二，採 e-GP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量測，布設發掘區 TWD97 絕對座標與高程控制點，採定焦鏡頭環繞拍攝發掘探坑的方式，影像後續

匯入 PhotoScan 軟體進行解算，建立三維模型與二維平面正射影像，紀錄發掘坑面不同時期的生活面文化遺留與城牆殘蹟結構的絕對空間與真實性遺存狀態。

三、舊城南門段城牆文化轉型堆積形成過程

鳳山縣舊城從清初期的漢庄，到 18 世紀初期設縣署建「土城」防禦，至 19 世紀初期改建「石城」，後因軍事防禦功能不彰而遭廢棄成為「舊城」，反映舊城的興衰與廢棄形成脈絡。

清康熙 43 年（1704），據《鳳山縣志》所載，鳳山縣署始設於漢人聚落興隆庄。康熙 57 年（1718）重修縣署，並建城隍廟，次年重修文廟，建興隆寺。康熙 60 年（1721）因朱一貴事件，興隆庄縣署殘破，清廷始興修城禦守。康熙 61 年（1722）鳳山知縣劉光泗始於興隆庄築臺灣首座「土城」，鳳山縣土城周八百一十丈，高一丈三尺，東西南北設四門，左倚龜山右聯蛇山，外浚壕塹，廣一丈深八尺（李丕煜 1961[1719]）。

嘉慶 11 年（1806），海盜蔡牽擾台，鳳山新城被攻陷焚掠。1807 年，福州將軍賽冲阿奏議縣治遷返舊城。清道光 5 年（1825）知府方傳穉募款與知縣杜紹祁督建興隆庄縣城為「石城」，《東槎紀略》：「石城，周八百六十四丈，城樓砲台各四，用番銀九萬兩千一百。又建知縣、典史衙署各一，倉廩監獄備具，參將衙署一，火藥局附，用番銀二萬五千，以次興修。尚餘銀三萬，為歲修之費。」此新建城牆，將原有城牆加以擴大，包圍龜山在內，高一丈二尺、寬一丈五尺，並以石砌築，上有雉堞，周八百六十四丈，仍置四門，又於四隅建立砲台四座（姚瑩 1957[1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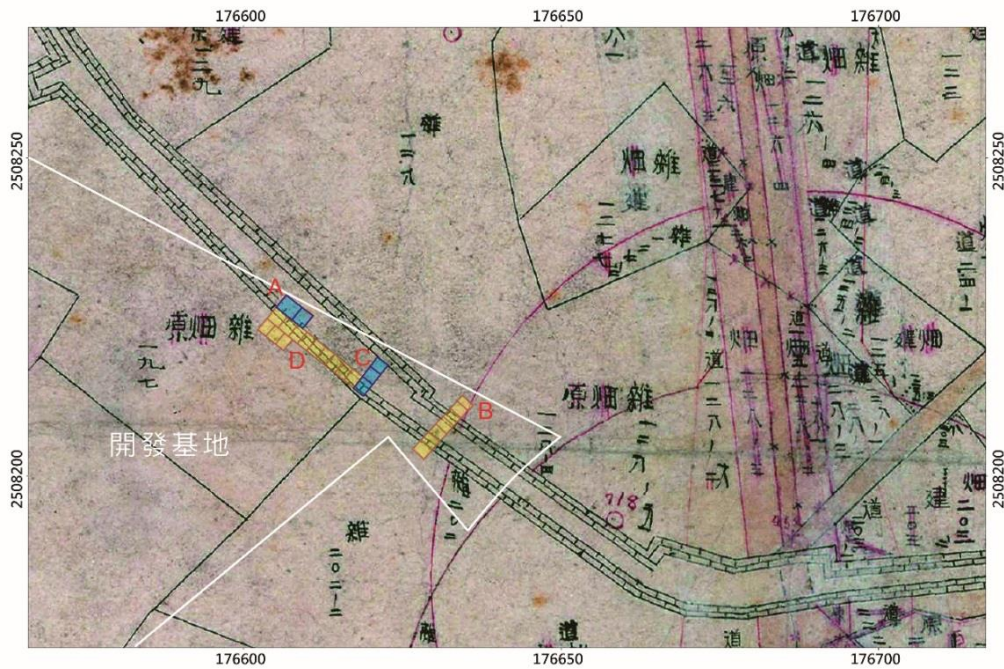
然今日鳳山縣舊城地景徒留殘破的城牆狀態，實歷經漢庄、築城、使用、戰亂、廢棄、拆除、軍事再利用、城牆史蹟修復等一系列複雜的文化轉型形成過程。人類學家伊能嘉矩於 1897 年來到鳳山縣舊城，紀錄下日治初期舊城的空間家戶數與人口。1900 年伊能嘉矩再度踏查舊城，對於舊城的文化地景或廢棄狀態有著較為深入的紀錄，指出當時的城牆規模雖仍大，然城內建築物多半頹壞，空餘屋基殘蹟，到處是茂密的荊棘，且大部分的古蹟均被遺棄，祠廟與石碑等不到十年將湮沒無存（伊能嘉矩 1996[1992]），凸顯日治初期鳳山縣舊城已然呈現廢棄中狀態，城牆亦已不具防禦功能。時至 1936 年，任職臺灣總督府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的尾崎秀真調查鳳山縣舊城，述及以石材建造城壁與城門的古城，已然殘破不堪，且西邊城牆均全部損毀，雖然舊城隨後

指定為臺灣總督府國定史蹟（尾崎秀真 1936），但不具防禦功能的城牆已逐年頹圯甚至傾倒崩塌。

伊能嘉矩與尾崎秀真於 1897-1936 年所見的鳳山縣舊城，呈現「廢棄中」狀態，城樓上不見石城雄踞時的兵衛戍守，城內民居建築與車水馬龍的繁華市街不復往昔，漢庄內鼎盛廟宇中香火繚繞膜拜神明的人們逐漸地消退與外移。此一「廢棄中」狀態無疑標誌鳳山縣舊城正經歷文化轉型過程中的一個特殊時空界面（圖版一），讓我們得以回溯探究原為康熙 61 年（1722）鳳山縣署興隆庄「土城」，過渡至道光 5 年（1825）新建「石城」，何以有著完整城池規模布局的官署、市街民居、廟宇信仰等城內均人去樓空且建築遭拆毀而不復存在呢？雄踞屹立與深壁固壘的石城城樓與城牆又何以殘破不全呢？

明治 36 年（1903）測繪的高雄市左營庄前鋒尾與埤子頭地籍圖資，對於舊城歷史考古而言相當地關鍵。精確丈量測繪下的前峰尾、埤子頭二張地籍圖，反映舊城城牆空間與城內土地地籍圖資，適合做為舊城歷史考古系統規劃的空間基礎。其次，此地籍圖測繪當時為舊城正處於廢棄中狀態，一則反映舊城長達 300 多年積累的土地利用型態與社會文化地景；二則當時城內建築空間尚存，適足以提供歷史考古學家尋溯舊城社會變遷與形成過程的一條途徑。本研究即以此實測的舊城地籍圖所反映的南門段城牆空間位置，進行有目的性的考古布坑與城牆保存狀態的評估分析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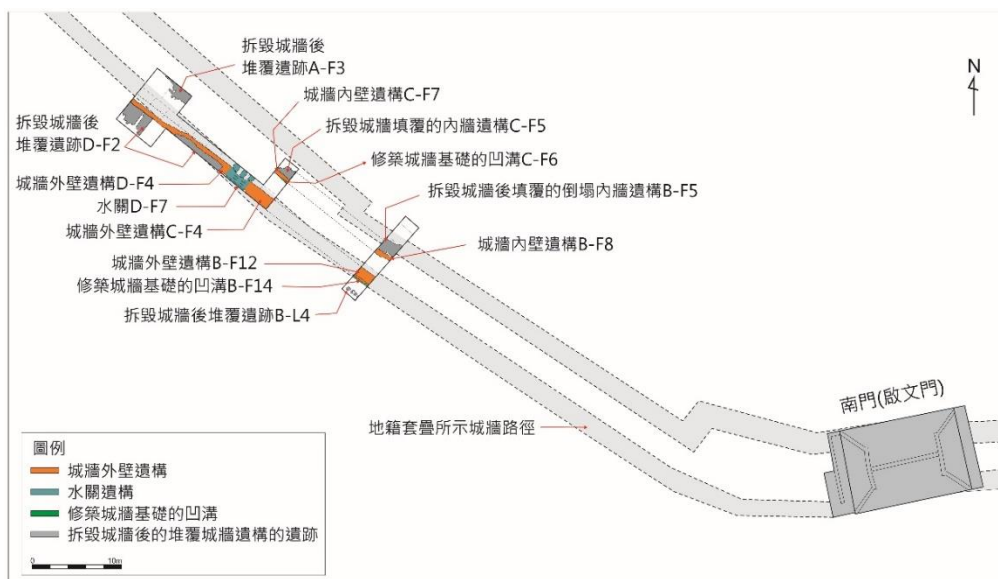
2018 年因應民間私人建設開發基地鄰近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南門，進行文化資產考古評估，目的為釐清城牆的空間分布、殘蹟保存狀態，評估其文化資產價值與行政處置措施。根據 1903 年日治時期測繪的鳳山縣舊城區域埤仔頭、前峰尾的地籍圖，套疊正射影像後確認開發基地位於南門段城牆穿越的敏感區範圍（圖三）。故，前後陸續布設 ABCD 等四個探溝，共計 23 個考古探坑。



圖三 鳳山縣舊城南門段空間地景與考古評估探坑分布圖
(底圖為 1903 年日治時期測繪的鳳山縣舊城前峰尾地籍圖所示的南門城牆區位)

鳳山縣舊城南門段的考古地層堆積序列，依序為 L1 現代填覆地層；L2 晚近填覆地層；L3 日治拆毀城牆後的填覆地層；L4 清代石城時期的堆積地層；L5 清代石城築城前的文化層；L6 自然堆積地層。L3-L5 地層，凸顯此地域原為 18 世紀漢庄聚落民居的生活空間，於 19 世紀上半葉 1825 年修築石城轉化為防禦城池功能，然卻於 19 世紀末的清末日初階段，逐漸地失去衛戍功能而呈現廢棄中狀態；1919 年因交通建設，南門城樓兩側城牆遭拆毀（圖版一 c），城樓成為圓環道路系統中心地標；1940 年前後因應海軍軍事需求再度拆除西南段城牆，充分反映舊城南門段地域從漢庄聚落－城牆戍衛－交通建設的功能轉化的文化轉型形成過程。

鳳山縣舊城南門段城牆考古發掘出土的相關重要遺跡（圖四），包括清代石城築城前的生活面堆積、石城築城過程相關遺跡、城牆牆體殘蹟、城牆水關殘蹟、日治時期拆毀城牆的埋埋遺跡等，反映整個南門段城牆從修築、使用、廢棄、拆毀等行為事件的形成脈絡。



圖四 鳳山縣舊城南門段城牆殘蹟分布圖（鍾國風、劉益昌 2019：80）

（一）日治佔居末期拆毀城牆的行為與填埋遺跡

鳳山縣舊城南門段城牆於 L3 層位，均可見日治時期拆毀牆後的砧砧石與灰漿等城牆結構體的堆覆遺跡，或是沿著城牆牆體側邊向下打破的帶狀凹溝，藉以填埋拆毀城牆牆體結構，此類打破地層後填埋的凹溝遺跡形成獨特人為製作的地層界面（interface），成為辨識與判斷地層的構成內涵、堆積模式、分層標準、發掘時序等重要訊息基礎。

在南門段發掘區的東南側 B 區探溝偏北側的探坑 TP3-TP5 之間，日治末期為了拆毀城牆，因而向下打破當時生活面以填埋城牆內壁牆體結構的凹溝（B-F4），B-F4 凹溝於填埋牆體構件後所形成的上口界面寬約 320cm，深度約 50-60cm，其人為打破地層填埋而形成的層位疊壓界面，成為觀察當時拆毀城牆行為重要的途徑。F4 凹溝內的填埋構成，堆積大量城牆結構體的破碎砧砧石，更可見當時拆牆時將城牆扳倒填埋的城牆內壁牆體（B-F5），B-F5 城牆內壁牆體被拆毀扳倒的傾斜角度為北偏西 37°，且 F5 牆體遺構傾斜的角度仍可與其南側緊鄰的原堆積內壁牆體殘留的基礎（B-F8）扣合，附加驗證了城牆內壁牆體被拆毀扳倒的行為與被填埋入 B-F4 凹溝內的堆積模式與形成過程（圖五、圖版二 a）。

拆毀城牆內壁牆體後向下打破填埋城牆結構的凹溝（B-F4），一路從 B 區沿著城

牆內壁牆體向西北側延伸至 C 區的 TP9 一帶，C 區於 L3 層位同樣有日治時期拆牆時向下打破填埋城牆壁體的凹溝遺跡（C-F5），C-F5 內多堆積拆毀城牆壁體的破碎硃砧石與灰漿塊，且 C-F5 南側緊鄰原堆積殘留的城牆內壁牆體結構（C-F7）（圖版二 b），同樣顯示南門段城牆在日治時期被拆毀與填埋的過程。此拆毀城牆的填埋凹溝遺跡，一路從 B-F4 往西北延伸至 C-F5，更持續延伸至 A 區的北側（A-F3）（圖版二 c），凸顯當時拆毀城牆的一致性行為。

城牆內壁牆體拆毀後向下打破填埋牆體所形成的填埋界面與考古地層，反映當時人們緊鄰著城牆內壁挖掘凹溝的方式，藉以填埋與堆覆拆毀的內壁牆體結構或是破碎的硃砧石與灰漿塊等牆體構件。此一拆毀城牆壁體的填埋行為，同樣反映在城牆另一面的城牆外壁牆體拆毀的填埋與堆覆過程。不過，城牆外壁牆體在拆毀與填埋的方式，稍與內壁牆體不一樣，而是將外壁牆體直接拆毀後堆覆在當時的生活面地表與殘留的城牆外壁牆體之上。在 B 區 TP7-TP8 的城牆外壁牆體基礎殘蹟（B-F12）上方，堆覆厚厚一層約 30cm，混雜硃砧石、灰漿塊的黏土層，即為拆毀城牆內外壁體間的中腹土與外壁牆體的堆覆現象，此一拆毀城牆外壁牆體的堆覆現象，一路沿著城牆外壁牆體從 B 區向西北延伸，經過 C 區 TP11 的城牆外壁牆體（C-F4）之上，經水關結構區（D-F7）（圖版二 d），一路延伸堆覆至 D 區西北端的 TP20—即為 D 區拆毀城牆外壁牆體後的填埋與堆覆行為（D-F2），F2 一方面沿著城牆外壁牆體外側填埋大量的硃砧石、灰漿塊等城牆構體（圖版二 e），或同時直接堆覆於城牆外側當時的清代生活面之上（圖六的 D-F2）。

關於舊城南門至西門之間城牆拆毀的時間與過程，首先於 1919 年日人為打通楠梓與哈瑪星之間的交通要道，遂興建貫穿舊城西北側的縱貫公路，南門城樓兩側城牆於公路興建過程中遭截斷，南門城樓成為圓環道路系統中心（圖版一 c）。其次，日方於 1940 年徵收完舊城內土地房舍並遷出城內居民後，因應左營軍事用途再度地拆除西南段城牆。依據出生於 1931 年居住在左營區新庄仔路的李武考先生的回憶，述及 1940 年（昭和 15 年）1 月時，其父親李文學受僱為當時拆除舊城城牆的工人，「工人拆牆時，先在城牆底部挖出一道深溝，接著打入木樁，再把繩子綁在城牆上方的雉堞，讓繩子連在滑輪上，然後使出蠻力，將城牆拉倒。...隔天一早上工時，城牆未如預期地崩塌，當李文學走近城牆正下方、探查深溝時，牆基上方的城牆突然坍塌，他一時驚慌跑錯方向...來不及逃跑的李文學除了頭部，幾乎全身被城牆的土方壓住，當場罹難。」（郭吉清、廖德宗 2018：35-36），李武考先生回憶父親因拆除舊城南門至西門段城牆

的傷痛記憶，也述說了當年城牆被拆毀的方式、過程與年代。

拆毀城牆的行為模式，先於城牆壁體旁挖掘一道深溝，再以人力方式將城牆壁體拉倒。此一拆除城牆方式，完全與考古發掘區拆除城牆內壁牆體後將城牆壁體填埋於人為挖掘凹溝的堆積模式一致。而深埋於日治拆牆當時生活面以下殘留的城牆壁體基礎，如 B 區的內牆壁體基礎（B-F8）、外牆壁體基礎（B-F12），則尚殘存於當時築石城的地表生活面之下。至於拉倒後的城牆壁體，可供利用的砗砗石或是城牆馬道磚、雉堞磚等，均被人們撿拾回收再利用。而無法再填入凹溝內的大量砗砗石、灰漿塊等破碎城牆構體，連同城牆內外壁牆體之間的中腹土，則堆覆於城牆牆體遺構與地表之上，形成厚厚一層混雜大量破碎砗砗石、灰漿塊的黏土層。

（二）清代南門段石造城牆與水關殘蹟

城牆殘蹟

舊城南門段城牆於 ABCD 發掘區位的延續性城牆基礎結構（圖五、六），因受日治時期拆毀城牆的過程，所以牆體基礎保存狀態不一。

首先，就發掘區南門段城牆空間分布而言，東南端 B 區位的 TP4-TP5 二探坑的坑界處，保有城牆內壁牆體殘留的基礎（B-F8），北側緊鄰日治時期拆牆時扳倒填埋的城牆內壁牆體（B-F5），F5 倒塌斜置的牆體，仍可與原堆積的內壁牆體殘留的基礎（F8）扣合（圖版二 a、三 a）。B 區城牆外壁牆體殘留的基礎（B-F12）則堆積於 TP7 坑位。

城牆內外壁體從 B 區向西北方的 C 區位延伸，城牆內壁牆體向西北延伸至 C 區 TP9-TP10 坑界間（C-F7）。城牆外壁則延伸至 C 區 TP11 殘留的外壁基礎（C-F4）（圖版三 b）。BC 區城牆內外壁牆體基礎底部之間距約為 234cm，此間距所形成的空間，即為築城過程中城牆內外壁體之間所填充的中腹土。

C 區城牆內壁向西北延伸至 A 區，不過受到日治時期拆毀城牆之故，已不見原堆積的城牆內壁牆體基礎。然城牆外壁則持續向西北延伸，從 C 區南端的 TP11 沿著 D 區 TP12，城牆外壁牆體（D-F4）雖受日治時期拆毀城牆行為影響（D-F2），不過城牆外壁牆體的基礎尚且保存良好，且於 TP13 區位出土城牆水關結構（D-F7）（圖版三 c）。殘留的 D-F4 城牆外壁牆體基礎持續延伸至 D 區西北端的 TP20 與 TP23 坑界（圖版三 d）。

其二，城牆結構與築城過程，從考古發掘出土的城牆殘蹟觀察，確認在 1825 年石城築城之際，此地點為土城內部的興隆庄民居活動區域。B 區 TP5 的 L5b-F7 生活面遺留現象、C 區 TP10 的 L5a-L5b 與 D 區 TP21 的 L5a-L5d 等堆積地層，顯示此地域在 1825 年築石城之前，人們仍有相當密集的活動，生活面上堆積蘊藏著 18-19 世紀前期人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瓷器皿與磚瓦建材等遺留。

此外，石城建造工法部分，於規劃設計好的城牆軸線上，打破 19 世紀初期的生活面，挖出二條平行寬約 180cm、深約 110cm 的凹溝，作為疊砌寬約 112cm 的石城城牆內外壁體基礎。內外壁體均以砗磲石疊砌，並以灰漿膠黏鞏固。B 區外壁體（B-F12）的軸向為北偏西 58°。內外壁體基礎構築完成後，再填覆城牆壁體基礎凹溝內剩餘空間（如 B-F14、C-F6），此為修築埋設城牆壁體基礎的凹溝，其與被打破的生活面形成重要的打破堆積界面（interface），是接續地層序列的重要行為證據。此外，在城牆壁體逐漸以砗磲石和灰漿交疊向上疊砌的過程，則於內外壁體之間填入中腹土，內外壁體間的寬度也逐漸略縮減，直到馬道所需高程與寬度後，不再填覆中腹土，且整理馬道中腹土呈平面，於中腹土上緣敷覆上厚約 15cm 上下的灰漿，再鋪設馬道磚，內外壁牆體則再向上修築防禦性的雉堞設施。

水關殘蹟

D 區於 TP12-TP13 之間，於當代堆覆地層或日治時期拆毀城牆後堆覆的砗磲石與灰漿塊（D-F2）地層之下，殘留迥異於城牆結構的水關殘蹟（D-F7）（圖六、圖版三 c）。

水關位置反映城牆所在地域沙丘地形與排水功能需求。水關通道二側壁體厚約 70cm，由平整的砗磲石疊砌而成，殘高約 70cm。水關通道底部由整平的砗磲石平鋪，通道東西向寬約 255-260cm，中間加砌一道寬約 50cm 的壁體分隔水道，水關接至城牆外壁處的水關開口，由三件寬度約 70-80cm、厚約 30cm 的長形花崗岩塊排列間隔而成，花崗岩塊間的縫隙間隔約 10cm，以阻隔城外的侵入。

水關底緣堆積有硬陶、貝類、砗磲石、灰漿、蝸牛殼等，從 1920 年代才引進臺灣的非洲大蝸牛堆積現象，研判水關通道在日治中期 1920 年代之際仍暢通使用，尚未遭受拆毀填埋。而在日治 1940 年拆毀城牆的堆覆過程中，大量的細碎磚瓦、砗磲石等，始填埋於水關通道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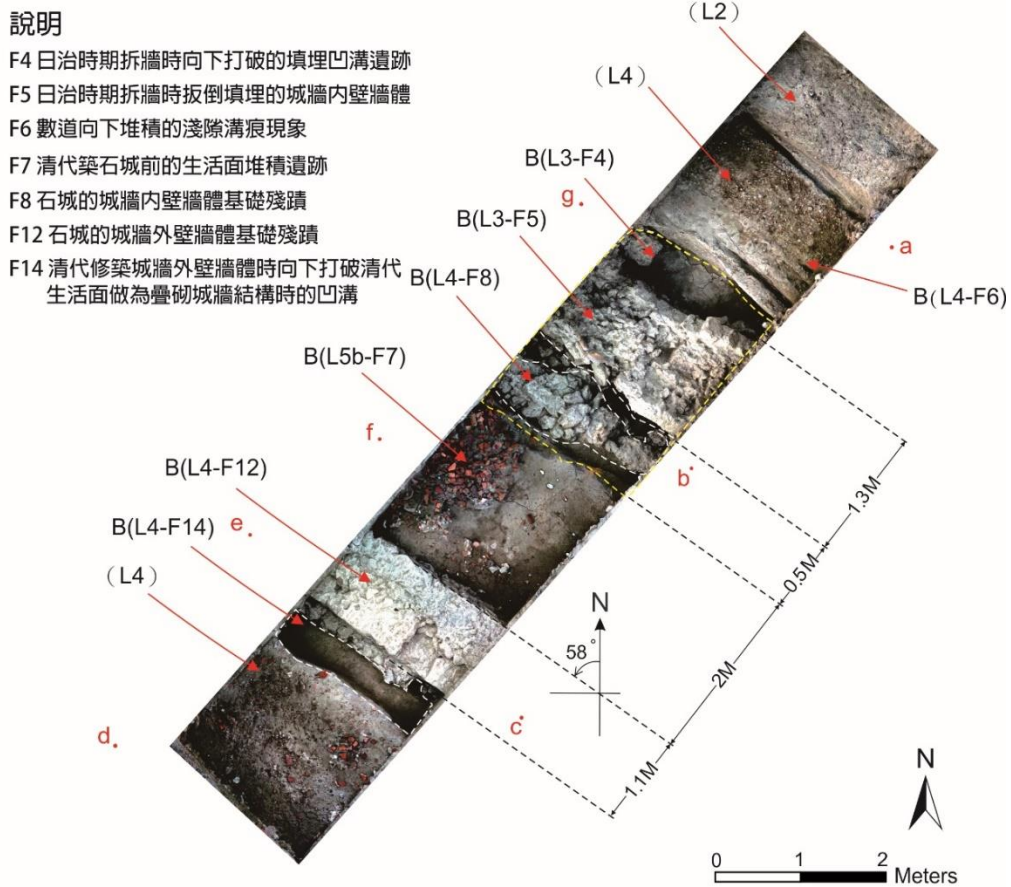
(三) 清代築石城前的佔居生活面堆積

B 區築石城之前的清中晚期生活面遺跡

舊城南門段城牆內外壁體間緩慢形成的原堆積文化層，如 B 區 TP5 層位 L5b 的 F7 生活面遺跡與 C 區 TP10 的 L5a-L5b 地層，均為未受 1825 年石城修築過程打破影響的清中晚期 18-19 世紀前期的文化層堆積。

B 區 TP5 層位 L5 的 F7 生活面遺跡，堆積於城牆內外壁體之間，L5 表層持續揭露磚瓦碎片、青花瓷器碎片等聚集現象。隨著 L5b 向下發掘，於地層 L5b 下緣呈現磚瓦密集向上堆疊於生活面上的堆積模式（B-F7）（圖五、圖版三 a、四 a），F7 內夾雜些許的瓷片，如青花仿梵紋杯等，均為清中晚期 18-19 世紀前期的青花瓷器（圖版四 b）。此外，F7 遺物組合以紅瓦比例最高達 61.2%、紅磚比例次高達 20%，凸顯 F7 和清代傳統磚瓦建築的廢棄有關。其他少量遺物如硬陶器類、打製圓板、爐壁、燧石器等，以及血蚶、歪簾蛤、文蛤、石田螺、麗島蜆等各種淡鹹水貝類（圖版四 c-f）。

B-F7 遺跡堆積於內外城牆壁體之間，於築石城時沒有被干擾或打破影響，而是原封不動地被城牆內外壁體之間的中腹土所覆蓋，故 F7 堆積遺留可謂見證築城之際最重要的物質遺留，一方面見證石城建造的時代與築城方式；二方面也反映石城築城之前，此區域即為更早階段興隆庄土城內的民居生活區域；三者，在石城建造後，緊鄰石城的二側區域，也從原來的民居生活空間轉變成為城牆防禦的邊戍區，直至舊城石城於 19 世紀沒落，最終於 1940 年前後被拆毀。此一地域空間功能轉變或文化轉型行為，亦反映在 D 區 TP21 的 L5 表層（L5a 層位）出土遺物，完全不見 19 世紀石城築城之後至 20 世紀 1940 年前後拆毀城牆期間的物質遺留。



圖五 B 區 TP3-TP8 探溝城牆殘蹟空間分布說明圖 (a-h 控制點具絕對座標與高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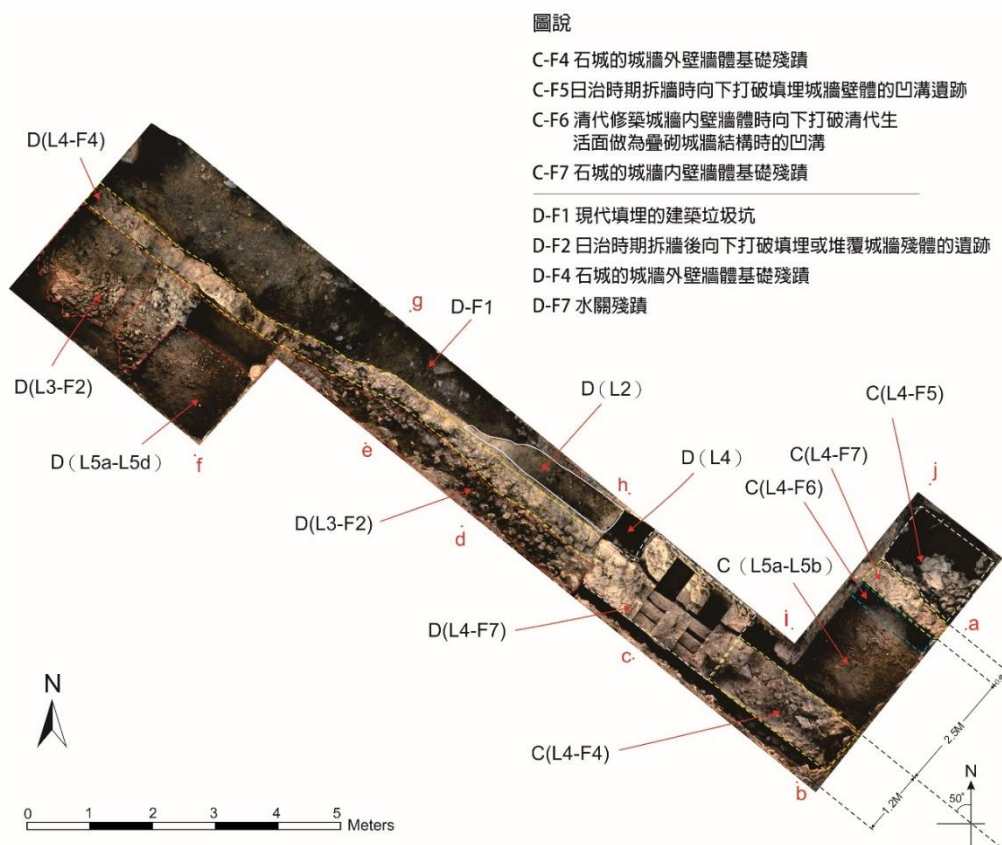
D 區築石城之前清中晚期石城外佔居的文化層堆積

南門段城牆的考古發掘坑位區，於城牆內外壁體間，仍保有石城建造前的原堆積文化層，如 B 區 TP5 (圖版三 a)、C 區 TP10 (圖版三 b)；城牆外壁體之外，如 D 區 TP21-TP23 區塊 (圖版三 d)。其餘大部分區域，均受到石城築城過程的打破行為、或是日治時期拆毀城牆的打破填埋行為所影響。

由於石城建造的年代為 1825-1826 期間，故石城建造之際的此區域，顯為 1825 年之前土城時期的城內興隆庄聚落區域範圍。

TP21 位於城牆外壁牆體 (D-F4) 的石城城外區域 (圖六)，L5a-L5d 發掘層位為 1825 年石城建造前的清代中晚期原堆積地層，最後於日治末期 1940 年拆毀城牆時被城

牆構體的砧砧石、灰漿塊、中腹土等 (D-F2) 所覆蓋。TP21 的 L5a-L5d 層位堆積年代為清代中晚期延續至日治末期。TP21 層位 L5a-L5d 的陶瓷器，包括：L5b 出土福建廣東製瓷器，流行年代約 19 世紀前期的印花青花瓷器，以及少量 18 世紀後持續使用的厚胎安平壺底部殘件與較為多樣的褐釉硬陶甕殘件、薄胎素燒的茶壺壺把殘件等。L5c 持續出土 18-19 世紀前期的各類破碎青花瓷器、褐釉硬陶甕殘件、褐釉薄胎的小壺形器殘件，以及流行於此時期作為製糖工具的糖漏底部。L5d 出土的青花瓷中，有 18-19 世紀前期的青花仿梵紋杯殘件、帶有壽字形的印花青花瓷器殘件，其他包括濕式製法的磚瓦、褐釉硬陶甕殘件、打製圓板、薄胎素燒茶壺壺把等遺物。



圖六 C、D 區 TP9-TP23 城牆殘蹟空間分布說明圖 (a-j 控制點具絕對座標與高程)

綜觀 TP21 層位 L5a-L5d 的遺物組合，一方面均不見任何日治時期遺留，其反映此區域在 1825 年築城後不再做為民居活動頻繁的區域，以及舊城城區內活動空間的重心已然轉移。二方面，清代青花瓷器如印花青花瓷器、青花仿梵紋杯等多為 18-19 世紀的青花瓷，產地多來自福建廣東窯址，同時反映了 18-19 世紀舊城內的漢庄聚落，人們透過生活日常所使用的飲食器皿風格，維繫著原鄉認同。

(四) 舊城南門段城牆區層位矩陣脈絡圖

南門段城牆考古發掘區複雜的人為地層 (man-made layer)，構成獨特的地層內涵與堆積行為模式，地層疊壓序列及其伴隨行為事件所構成的考古地層堆積脈絡 (圖七) 依序為：

1. L1 現代活動地層

相關的遺跡包括：從 L1 向下打破至 L6 的垃圾坑，如 AD 區位的 F1 (AD-F1)、C-F1；近代房屋地基結構 B-F1、砗磲石與紅磚堆砌結構 B-F2。

2. L2 戰後眷村佔居活動地層

相關遺跡為現代理管行為的打破現象 B-F9。

3. L3 日治佔居時期拆毀城牆後的堆覆地層

拆毀城牆行為與向下打破填埋城牆構體的凹溝遺跡，反映獨特的地層界面、構成與堆積行為模式。相關的遺跡可分成幾組：

日治時期拆毀城牆後的填埋堆覆遺跡 A-F3、B-F3、B-F10、B-F11、B-F13、CD-F2、C-F3。

日治時期拆毀城牆時向下打破的填埋凹溝遺跡 B-F4、C-F5。

日治時期拆毀城牆時扳倒填埋的城牆內壁牆體 B-F5。

4. L4 清代石城佔居時期的堆積地層

修築城牆時向下打破清代生活面做為壘砌城牆基礎結構的凹溝遺跡，反映獨特的牆體直立地層與建造牆體的地層界面。相關的遺蹟可分成幾組：

石城的城牆內壁牆體基礎殘蹟 B-F8、C-F7。

石城的城牆外壁牆體基礎殘蹟 B-F12、CD-F4。

清代修築城牆內壁牆體時向下打破清代生活面做為疊砌城牆基礎結構時的凹溝 B-F14、C-F6。

水關殘蹟 D-F7。

5. L5 清代漢庄與土城佔居時期的文化層

B 區 TP5 築石城之前的清中晚期文化層與生活面遺跡 B-F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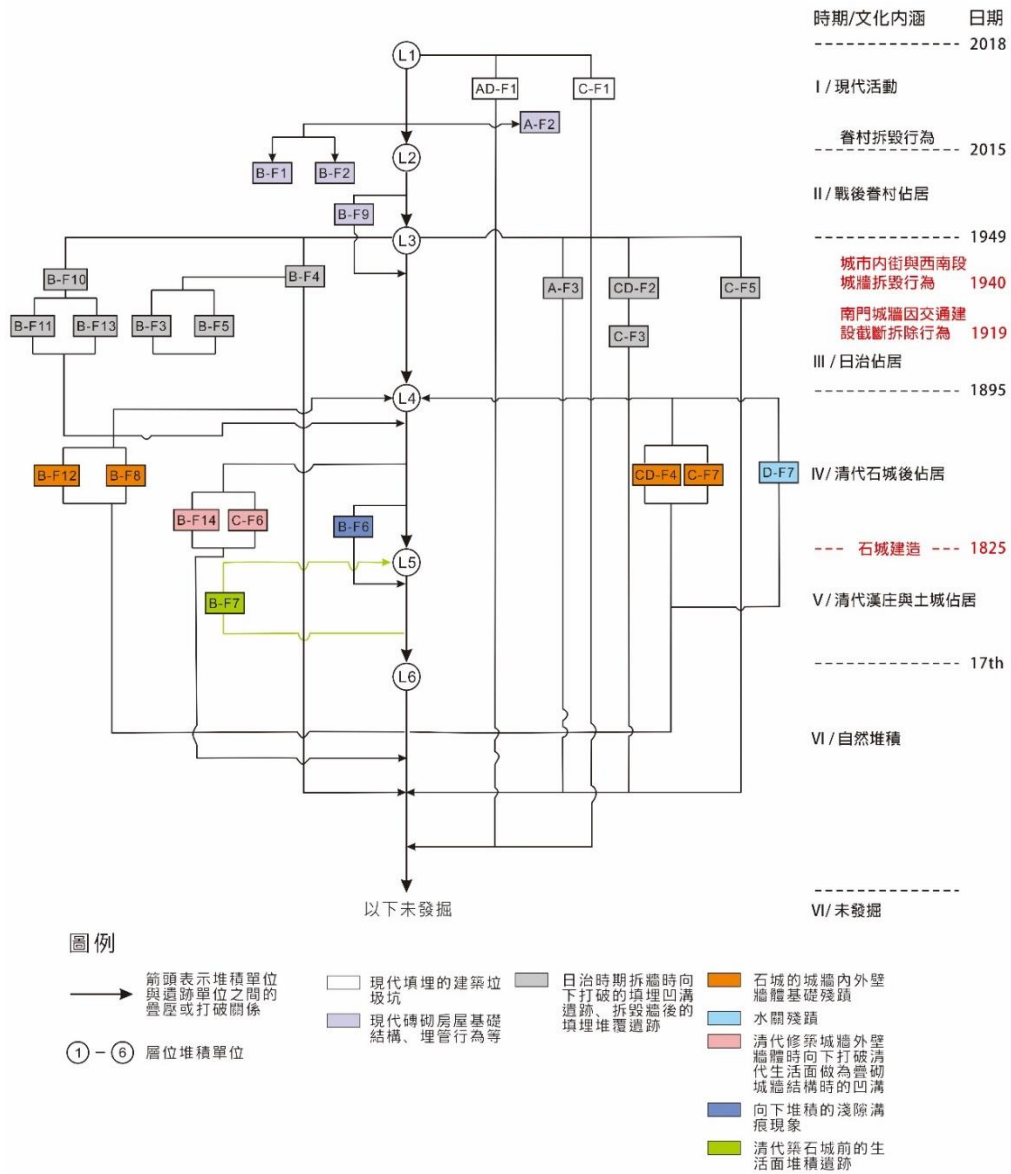
C 區 TP10 築石城之前的清中晚期文化層。

D 區 TP21 築石城之前的清中晚期文化層。

6. L6 自然堆積地層

南門段城牆發掘區地層的構成行為模式與時間序列，依序為早期的 L5 清代石城建造前佔居的文化層，源於 17 世紀末至 19 世紀初漢庄聚落民居的生活空間。L4 清代石城佔居時期的堆積地層，為 19 世紀初 1825 年因修築石城後，從漢庄民居轉化為城池防禦功能，然舊城卻於 19 世紀中末期至日治初期階段逐漸地失去政治位階與防禦功能而呈現廢棄中狀態。L3 日治佔居時期拆除城牆後的堆積地層，源於 1919 年因交通建設南門城樓二側城牆遭截斷拆除，城樓成為圓環道路系統中心地標，1940 年前後因應海軍軍事需求再度拆除西南段城牆，充分反映南門段城牆功能轉化的歷程，從修築、使用、廢棄、拆毀等文化轉型過程的形成脈絡。

鍾國風·鳳山縣舊城南門段城牆考古地層的廢棄形成過程



圖七 南門段城牆考古發掘區地層堆積脈絡圖

四、結語

考古地層建構過程，從 19 世紀採借自地質學地層疊壓原理，文化歷史學派時期至 1950 年代 Kenyon 和 Wheeler 的網格系統發掘策略，大體仍著重在遺物與地層垂直剖面

的時間序列，然地層剖面以外的平面表層（surface）仍被忽視。1960 年代北美過程主義學派階段，關注考古學問題的設計與抽樣方法，Schiffer（1972）主張遺址形成過程理論上的探究。Stein（1987）基於土壤沉積學原理，視人為活動遺留形成的地層，有別於純自然沉積的文化地層單位，同時關注文化轉型與自然轉型並進的遺址形成過程。此時期，關於遺址表層空間維度的問題，歐洲 Barker（1975）開啟「開放區域發掘法」（open area excavation），採自然層位全面揭露發掘法，發掘方法上產生典範轉移，對於考古地層的關注，從垂直剖面轉換成平面空間，然而紀錄方法仍未改變。直至 1973 年 Harris 發明「哈里斯矩陣」，主張考古遺址的地層序列與時間相關聯並形成可辨識遺址的「日曆」或「DNA」，因此層位證據可轉譯成圖表，哈里斯矩陣遂成為審視考古遺址相對時間序列的重要方法，具有普遍適用性，已是世界上許多國家考古地層發掘紀錄的「標準作業」，適合應用於具多時期佔居、複雜行為、反覆疊壓打破堆積地層的考古遺址（Harris 2017）。

鳳山縣舊城歷史時期複雜的考古地層，蘊藏過去人類活動豐富與多元的生活遺物與遺跡。本研究思考鳳山縣舊城廢棄形成過程中，文化轉型形成的考古地層的空間維度與堆積序列的複雜性，研究之初首重問題取向的整體性研究規劃與設計；發掘策略朝向開放區域發掘法，關注層位表層的空間維度；發掘方法採自然層位發掘法，解構地層堆積空間脈絡與時間序列；地層紀錄與分析方法運用哈里斯矩陣分析層位脈絡關聯性，以提升考古紀錄的全面性與系統性。

「鳳山縣舊城考古計畫」整體性的研究規劃與設計，以 1903 年日治時期測量地籍圖資所反映的舊城社會地景，做為舊城歷史考古系統性空間規劃的基礎。此考古規劃設定，一方面擺脫以往抽樣試掘研究與被動式文資評估，難以全面瞭解舊城的地域空間與社會文化樣貌的遺憾；其二，舊城考古研究的整體長時期規劃設計，得以分期進行階段性、目的性的考古研究項目。

發掘策略採取「開放區域發掘法」，而非帶有橫樑隔開的探坑網格系統，以避免網格狀的隔樑土牆，阻礙發掘過程考古地層所反映的人們作用於生活面所形成的文化地景的整體性理解。發掘方法上採取「自然層位發掘法」的單一地層脈絡單位的發掘紀錄方法，而非固定人工水平發掘（arbitrary excavation），避免多重時間堆積的遺物與遺跡被發掘紀錄在同一人工層位內造成堆積脈絡上的混淆。此外，自然層位的單一地層單位的發掘方法，從地層「垂直剖面」紀錄遺物與層位關係的時間序列，轉向關注各階段佔居生活面活動行為的空間脈絡，即從垂直時間序列轉向地層表面的三維時空脈絡。自然層

位發掘方法依據地層構成—土色、土質、遺物、堆積模式等，做為觀察、判斷、劃分不同考古堆積單位，如縣前街區拆除市街建築後堆覆地層的破碎磚瓦構成內涵與堆積模式，或如本文南門段城牆地域的佔居生活面堆積地層、城牆殘蹟、水關殘蹟、建築基礎結構等。發掘過程需隨時觀察與判斷不同堆積單位之間疊壓打破關係的界面，如南門段城牆建造時挖掘城牆壁體基礎的凹溝、拆毀城牆時填覆牆體構件的填埋凹溝等遺跡。發掘順序按照地層或遺跡（考古地層單位）的堆積時間序列，由上而下、由晚至早，依循地層堆積形成過程予以發掘與紀錄。自然層位發掘方法的優勢，為循序紀錄不同階段人們生活面空間單元的布局與堆積脈絡，得以解構鳳山縣舊城複雜的歷史層位與相關行為事件的形成過程。

鳳山縣舊城擁有複雜的聚落與城垣更迭歷史，本研究以南門段城牆區位的考古層位資料，進行哈里斯矩陣系統層位分析，探究舊城從建造、使用、廢棄、拆毀等文化轉型過程，如何具體呈現在人為製造的地層堆積、疊壓、打破、填埋等一系列形成過程背後的事件與行為意義，建構舊城南門段城牆的地層堆積與疊壓的時間序列與形成脈絡。

舊城南門段城牆區的哈里斯矩陣層位脈絡圖，反映南門段城牆的地層與遺跡疊壓打破的考古地層序列，從清代石城築城前漢庄佔居的生活面堆積；石城建造施工過程人工挖掘的牆體基礎凹溝遺跡、城牆牆體與水關等直立地層，有助於理解石城的築城和使用的形成過程。日治末期拆毀城牆的行為事件，涉及人為打破地層填埋牆體所形成的凹溝界面，反映整個南門段城牆廢棄與拆毀的形成過程。城牆所在的地域，從 18 世紀漢庄聚落民居的生活空間，於 19 世紀上半葉 1825 年修築石城轉化為城池的防禦功能，然卻於 19 世紀末的清末日初階段逐漸地失去戍衛功能而呈現廢棄中狀態，1919 年因應交通建設南門城牆遭截斷拆毀，城樓轉換功能成為圓環道路系統中心，直至 1940 年因左營軍港和軍事設施需求再度拆除西南段城牆，充分反映南門段城牆地域從漢庄、築城、使用、戰亂、廢棄、拆毀、交通建設、軍事再利用等文化轉型形成過程。

鳳山縣舊城南門段城牆的開放區域發掘策略、自然層位發掘方法與哈里斯矩陣分析層位脈絡，一方面依照地層疊壓與打破的堆積時間序列解構複雜的考古層位，有助於建構舊城形成過程背後的行為事件與意義。二方面得以綜觀歷史過程所有層位的系統性脈絡關聯性，探究舊城文化轉型的廢棄形成過程。

致謝

本文得以完成特別感謝劉益昌先生與趙金勇先生，慨允使用「鳳山縣舊城考古計畫」（2016-2019）資料進行本研究論文書寫，特於此致謝。此外，感謝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曾義星教授團隊，協助南門城牆遺跡影像的三維建模。然拙稿若有欠思慮與不周全之處，均文責自負。

附註

1. Çatalhöyük 研究計畫（簡稱 CRP）的設計，反身方法落實原則涉及跨學科與跨國團隊的參與、田野發掘層位與實驗室研究人員之間就層位採樣之間協商、在遺址上對出土遺物進行分析和處理、單一脈絡紀錄系統方法、發掘日誌的闡釋與反思、視覺影像與多媒體的應用、人類學家參與對考古學闡釋過程與知識生產進行研究等，企圖呈現多元話語與詮釋空間，而非僅僅單向地接受考古發掘的權威解釋（Hodder 1997）。此外，Atalay 提倡原住民考古學（indigenous archaeology）理論與方法，運用於非原住民土地的 Çatalhöyük 遺址與社區，強調與當地村民協作且共享知識與考古訊息，促成多元話語（multivocality），實踐協作方法於考古田野與遺產管理（Atalay 2007）。
2. 「鳳山縣舊城考古計畫」指 2016 年以來個人主持與協同的鳳山縣舊城考古相關計畫，包括《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史蹟活化利用保存及展示計畫－大小龜山及左營舊城地區》（2016-2018）、《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疑似南門段遺跡緊急清理及防護計畫》（2019）、《高雄市左營區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考古調查發掘暨展示研究計畫》（2018-2020）。
3. 鳳山縣舊城首次考古試掘工作，為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等因應科技部「臺灣早期漢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研究」專題研究計畫（NSC-76-0801-H-001-40G）的一部分。

參考書目

伊能嘉矩

1996[1992]《台灣踏查日記（上）（下）》。楊南郡譯註。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何傳坤、劉克竑、鄭建文、陳浩維

2001《高雄市左營遺址範圍及保存價值研究計畫》。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尾崎秀真

1936〈第10：舊城址〉。刊於《史蹟調查報告》第二輯。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頁37-38。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李丕煜

1961[1719]《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姚瑩

1957[1829]《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郭吉清、廖德宗

2018《左營二戰密史：震洋特攻隊駐臺始末》。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國家文物局

2009《田野考古工作規程》。北京：文物出版社。

湯惠生

2013〈哈里斯矩陣：考古地層學理論的新進展〉。《考古》3：91-99。

趙金勇、劉益昌、鍾國風

2013〈花岡山遺址上層類型芻議〉。《田野考古》13(2)：53-79。

趙輝、張海、秦嶺

2014〈田野考古的“系絡圖”與紀錄系統〉。《漢江考古》131：41-49。

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

1993〈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3)：763-865。doi: 10.6355/BIHPAS.199312.0763

劉益昌、李德河

2004 《高雄市左營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隆營區」考古試掘計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劉益昌、趙金勇、鍾國風

2015 〈從花岡山遺址2014考古試掘談斜坡堆積的自然層位發掘問題〉。「2014年度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5月1-2日。

劉益昌、顏廷仔、王淑津、林美智

2009 《高雄市左營區舊城遺址範圍內「外興隆營區」考古試掘之出土標本研究計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鍾國風、劉益昌

2019 《國定古蹟鳳山縣舊城疑似南門段遺跡緊急清理及防護計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鍾國風、劉益昌、趙金勇

2018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史蹟活化利用保存及展示計畫－大小龜山及左營舊城地區》。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

顏廷仔

2014 《暫訂古蹟鳳山縣舊城西門段城門及城牆遺跡考古學清理計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社團法人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

2015 《原西自助新村（鳳山縣舊城西門段城內空間）考古試掘及研究計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社團法人台灣打里摺文化協會。

Atalay, Sonya

2007 Global Application of Indigenous Archaeology: Community 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Turkey. *Archaeologies* 3(3): 249-270. doi: 10.1007/s11759-007-9026-8

Barker, Philip

1975 Excavations at the Site of the Baths Basilica at Wroxeter 1966-74: An Interim Report.

Britannia 6: 106-117. doi: 10.2307/525992

Biddle, Martin

1964 Excavations at Winchester, 1962-3: Second Interim Report. *Antiquaries Journal* 44(2): 188-219. doi: 10.1017/S0003581500018114

1975a Excavations at Winchester, 1971: Tenth and Final Interim Report: Part I. *Antiquaries Journal* 55(1): 96-126. doi: 10.1017/S0003581500035514

1975b Excavations at Winchester, 1971: Tenth and Final Interim Report: Part II. *Antiquaries Journal* 55(2): 295-337. doi: 10.1017/S0003581500008258

Binford, Lewis R.

1964 A Conside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American Antiquity* 29: 425-441. doi: 10.2307/277978

Borao Mateo, José E.

2015 Overview of the 2011 and 2012 Field Seasons' Excavation in Heping Island. *In* *Recovering the Past of Jilong: 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from Heping Island of Northern Taiwan*.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and Hsiao-chun Hung, eds. Pp. 93-103.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Carver, Martin

2005 Key Ideas in Excavation. *In* *Archaeology: The Key Concepts*.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eds. Pp. 79-83. London: Routledge. 陳勝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doi: 10.4324/9780203491096

Crutzen, Paul J., and Eugene F. Stoermer

2000 The "Anthropocene".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41: 17-18.

Cruz Berrocal, María, Elena Serrano Herrero, Marc Gener Moret, Antonio Uriarte González, Mar Torra Pérez, Susana Consuegra Rodríguez, Alexandre Chevalier, Frederique Valentin, and Cheng-hwa Tsang

2018 A Comprised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Taiwan through the Long-Term Record of Heping Dao, Keelu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9: 425-441. doi: 10.1007/s10761-017-0453-y

Cruz Berrocal, Mar ía, Elena Serrano Herrero, Susana Consuegra Rodríguez, Mar Torra Pérez, Marc Gener Moret, Sandra Montón Subías, and Cheng-hwa Tsang

- 2015 Continuity and European Disruption in the Heping Island Archaeological Record: Excavation of Test Pits T2P8 and T3P1. *In* Recovering the Past of Jilong: 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from Heping Island of Northern Taiwan.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and Hsiao-chun Hung, eds. Pp. 117-134.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D'Amore, Leandro

- 2014 Stratigraphy in Archaeology: A Brief History.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 Claire Smith, ed. Pp. 7085-7093. New York: Springer.
doi: 10.1007/978-1-4419-0465-2_1031

Harris, Edward C.

- 1977 Unit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fication.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0(1): 84-94. doi: 10.1080/00293652.1977.9965274
- 1979 Principle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London: Academic Press.
- 1989 Principle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2nd Edi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 2014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A Paradigm for the Anthropocen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1(1): 105-109. doi: 10.1558/jca.v1i1.105
- 2017 Harris Matrices and the Stratigraphic Record. *In* Encyclopedia of Geoarchaeology. Allan S. Gilbert, ed. Pp. 403-410. New York: Springer.
doi: 10.1007/978-1-4020-4409-0_7

Harris, Edward C., and Patrick J. Ottaway

- 1976 A Recording Experiment on a Rescue Site. *Rescue Archaeology* 10: 6-7.

Harris, Edward C., Marley R. Brown, III, and Gregory J. Brown

- 1993 Practice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London: Academic Press.

Hodder, Ian

- 1997 Always Momentary, Fluid and Flexible: Towards a Reflexive Excavation Methodology. *Antiquity* 71: 691-700. doi: 10.1017/S0003598X00085410
- 2000 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 The Example at Çatalhöyük.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Hooke, Roger LeB.

2000 On the History of Humans as Geomorphic Agents. *Geology* 28(9): 843-846.

doi: 10.1130/0091-7613(2000)028<0843:OTHOHA>2.3.CO;2

Kenyon, Kathleen M.

1952 *Beginning in Archaeology*. London: Phoenix House.

Lucas, Gavin

2001 *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203132258

Redman, Charles L.

1987 *Surface Collection, Sampling, and Research Design: A Retrospective*. *American*

Antiquity 52(2): 249-265. doi: 10.2307/281779

Richards, Julian D., Carolyn Heighway, and Sara Donaghey

1989 *Union Terrace: Excavations in the Horsefair (The Archaeology of York)*. London:

Council for British Archaeology.

Ruddiman, William R.

2005 *Plows, Plagues, and Petroleum: How Humans Took Control of Clim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lvador, Amos

1994 *International Stratigraphic Guide: A Guide to Stratigraphic Classification,*

Terminology, and Procedure, 2nd Edition. Boulder: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chiffer, Michael B.

1972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ic Context*. *American Antiquity* 37(2): 156-165.

doi: 10.2307/278203

Stein, Julie K.

1987 *Deposits for Archaeologists*.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1:

337-395. doi: 10.1016/B978-0-12-003111-5.50009-9

1990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In* Archaeological Geology of North America, Centennial Special Volume 4. Norman P. Lasca and Jack Donahue, eds. Pp. 513-523. Boulder: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doi: 10.1130/DNAG-CENT-v4.513

2001 A Review of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Geoarchaeology. *In* Earth Sciences and Archaeology. Paul Goldberg, Vance T. Holliday, and C. Reid Ferring, eds. Pp. 37-51.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doi: 10.1007/978-1-4615-1183-0_2

2005 Principles of Stratigraphic Succession. *In* Archaeology: The Key Concepts. 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eds. Pp. 181-185. London: Routledge. 陳勝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Stein, Julie K., and Vance T. Holliday

2016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 *In* Encyclopedia of Geoarchaeology. Allan S. Gilbert, ed. Pp. 33-39. Dordrecht: Springer. doi: 10.1007/978-1-4020-4409-0_3

Wheeler, Morti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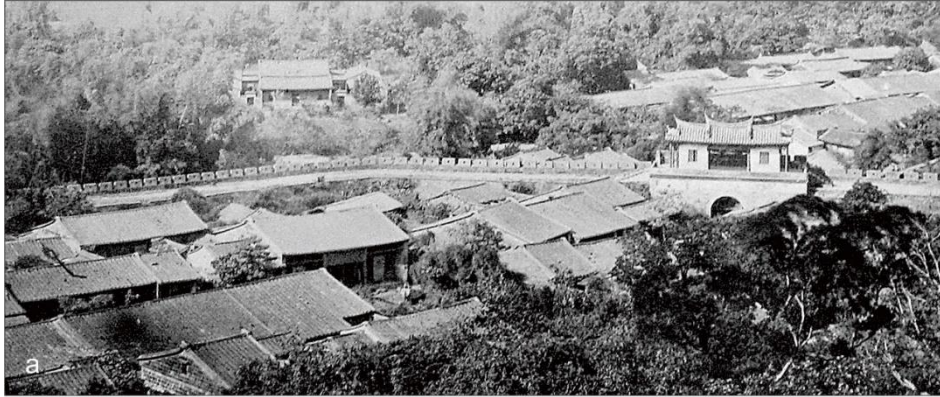
1943 Maiden Castle, Dorset: Reports of the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X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6530/OAPEN_1002324

1954 Archaeology from the E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kinson, Bruce H.

2005 Humans as Geologic Agents: A Deep-Time Perspective. *Geology* 33(3): 161-164. doi: 10.1130/G21108.1

附錄：圖版



門城舊(雄高)
THE KYUJOMON (THE GATE OF OLD-CASTLE). (FORMOSA TAKAO)



圖版一 鳳山縣舊城舊照片 (a. 舊城聚落北門城樓內外的市街民居。典藏單位：美國國會圖書館。授權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b. 日治時期北門內街余榮和家族與清代民居建築。授權單位：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c. 舊城南門「啟文門」，城樓已塌毀。城樓兩側城牆於 1919 年縱貫公路興建過程中拆除，南門城樓成為圓環道路系統中心，西側牛車自城牆斷面旁穿越而過，仍清晰可見城牆內外壁體。授權單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圖版二 日治時期拆毀南門段城牆的行為與遺跡 (a. B 區域牆內壁牆體殘留基礎 B-F8 與日治拆牆扳倒填埋的城牆內壁牆體 B-F5。b. C 區域牆內壁牆體殘留基礎 C-F7 與日治拆牆填埋城牆內壁牆體的凹溝 C-F5。c. A 區內壁牆體被拆毀堆覆狀態的 A-F3 遺跡。d. D 區水關 (D-F7) 與外壁牆體拆毀填埋的 D-F2 遺跡。e. D 區北側外壁牆體 (D-F4) 被拆毀填埋的 D-F2 現象。)



圖版三 舊城南門段城牆殘留基礎 (a. B 區城牆內壁牆體殘留基礎 (B-F8)、外壁牆體殘留基礎 (B-F12)，內外壁體間被封蓋的清代築石城前的生活面堆積 (B-F7)。b. C 區城牆內壁牆體殘留基礎 (C-F7)、外壁牆體殘留基礎 (C-F4)。c. D 區南側 TP12 坑位的水關 (D-F7)。d. D 區 TP21-TP23 殘留的城牆外壁牆體殘留基礎 D-F4。)



圖版四 B 區 TP5 層位 L5b-F7 築石城前生活面遺跡與遺物組合 (a. B 區城牆內外壁體間生活面遺跡 F7 的發掘照。b. 18-19 世紀前期的青花瓷器類。c. 各式硬陶器。d. d1、d2 為網墜正反面；d3 為燧石器。e. e1、e2 為紅磚；e3、e4 為紅瓦。f. 各種貝類遺留。)